

广义叙述学研究



“真相”的形式之谜：国产悬疑剧的叙述困境与价值旋涡^①

陈文斌

摘要：悬疑作为叙述的普遍特征难以作为类型描述，而悬疑剧作为类型剧却又有形式共性。因此，本文试从形式分析入手，将“真相”作为悬疑剧主导风格与概念界定的关键词，并在此基础上，剖析国产悬疑剧的叙述程式，归纳出个人与集体、善与恶、真相与谎言这三重价值旋涡。国产悬疑剧的异质性恰在于颠倒价值旋涡排序，从而与实在世界形成对照，满足了观众僭越常规、获取真实的意义冲动，由此也映射出后真相时代大众的情感结构。

关键词：悬疑剧 真实 后真相 情感结构

The Formal Mystery of “Truth”: The Narrative Dilemma and Value Vortex of Domestic Suspense Dramas

Chen Wenbin

Abstract: Suspense as a general feature of narrative is difficult to be described as a genre, while suspense dramas as a genre have formal commonality. Therefore, this paper tries to start from the formal analysis, taking

^①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真实’意义的符号美学研究”（Y030232059002035）阶段性研究成果。

“truth” as the keyword of the dominant style and conceptual definition of suspense dramas. And on this basis, it analyzes the narrative program of domestic suspense dramas, and articulates the triple value vortex of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good and evil, truth and lies. The heterogeneity of domestic suspense dramas lies in the reversal of the order of value vortex, which contrasts with the real world and satisfies the audience's impulse to transgress the norms and obtain the truth, thus mapping out 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the public in the post-truth era.

Keywords: suspense drama; truth; post-truth; emotional structure

作为一种类型的悬疑片或悬疑剧，其定义始终边界不明，究其原因，悬疑作为类型描述本身就是空泛的。悬疑，就其字面义而言，关涉“悬念”与“疑问”两个关键词。一方面，“悬念”指“欣赏戏剧、影视剧或其他文艺作品时，观众、读者对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很想知道又无从推知的关切和期待心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p. 1485）。换言之，“悬念”显露的是文本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且通过制造两者的区隔来生成表意的张力。另一方面，“疑问”肇始于叙述形式阻断或延缓真相的解释，即“疑问”处理的是文本内部的叙述策略问题，通过破坏事件因果链的完整性制造意义的悬搁。两相结合，“悬念”的心理层肇始于设置“疑问”的叙述层，且叙述形式又引发个人/社群对真相意义的阐释。总结来看，悬疑是所有叙述作品的共性，也是文艺作品与接受者之间的普遍关系。基于此，本文试图界定作为一种类型的国产悬疑剧，通过剖析其兴起与繁荣的原因，探究叙述形式背后潜藏的价值旋涡，由此指明后真相时代当代观众的情感结构与意义需求。

一、悬疑的兴起与真相的离场

国产悬疑剧的繁荣以《隐秘的角落》（2020）为典型，该剧引发全民热议，也映射了民众情感需要的集体满足与释放。在此之前，《少年包青天》（2000）、《神探狄仁杰》（2004）、《大宋提刑官》（2005）等已开古装悬疑剧的先河，《法医秦明》（2016）、《白夜追凶》（2017）、《无证之罪》（2017）展现了悬疑剧作为类型剧的成熟。随着《隐秘的角落》的爆火，爱奇艺“迷雾剧场”不断推出佳作，《沉默的真相》（2020）、《八角亭迷雾》（2021）、《回来的女儿》（2022）、《尘封十三载》（2023）等巩固并强化了悬疑剧的市场布局。

近年来,《漫长的季节》(2023)、《繁城之下》(2023)、《三大队》(2023)、《黑土无言》(2024)等剧延续并强化了国产悬疑剧的繁荣态势。国产悬疑剧的井喷式生产,加上观众的持续性期待,使得对国产悬疑剧的研究成为一种理论要求与现实必然。

国产悬疑剧的兴起与繁荣,不只是某种类型剧叙述程式的成功,更重要的是特定叙述形式满足了观众的某种意义需求与情感期待。举例来说,肥皂剧的成功立足于观众对意义浅化的需求,现实过于沉重,肥皂剧的浅薄恰可以让观众放弃深度思考的压力,满足其放松的意义期待。与之相反,正剧的成功往往建基于某种严肃思考的需要,比如历史剧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战争剧对民族正义的宣扬,反腐剧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不同类型剧自有其形式特性与意义追求,悬疑剧作为一种类型的崛起始终与观众特定的意义需求相关,这也恰是本文剖析的重点。

为了研究对象的明晰,我们仍需要先对作为一种类型的悬疑片/剧确定定义,因为现有定义始终存在边界过宽的问题,如“影片中的人物将面对什么样的未来,影片将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对于端坐于影院中、等待影片在银幕上呈现的观众而言,始终处于未知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的电影都可称之为‘悬疑电影’”(邱振刚,2020,p.74)。这一判定将“悬疑”意义泛化,无限度地放宽了类型的定义,也抹除了类型的边界。又如“只要以悬疑构置叙事,基本都可以冠之以某某悬疑片”(杨晓林,2019,p.30),凸显了悬疑作为叙述必备要素的特点,但也消解了悬疑剧作为一种类型的确定性。

上述边界过宽的定义,搁置了主导风格的制约性,由此丧失划定类型剧的理论效力。换言之,不同类型的影视剧自有其形式风格,且由某种形式风格限定类型特质,再者,这些形式风格可以相互组合,且不妨碍主导风格的判定。例如古装奇幻剧或现代奇幻剧的主导风格始终为奇幻,故事背景变换无法动摇类型剧的本质。但由于“悬疑”作为叙述策略过于普遍,将其作为主导风格就需要限定“悬疑剧”在叙述形式上的特质,以免边界过宽导致定义泛化。

事实上,“类型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故事可以不断上演并且有可以因循的规律或传统,观众从中可以预期一部类型电影中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普林斯,2018,p.267)。这指示了类型判定的双重标准:形式重复与观众预期。对应到悬疑剧这一类型,形式上始终在重复的规律或传统就是剧中人物始终在追寻“真相”,而观众预期的结果就是剧情结尾揭示“真相是什么”。换言之,悬疑剧的主导风格始终围绕着“真相”这一关键词展开。

具体而言，悬疑剧作为一种类型的确认仰赖于“真相”的设置，这使得悬疑剧始终具备一种结局导向的类型要求。也就是说，贯穿悬疑剧的核心策略就是设置谜团并揭露真相，不论这中间加入爱情元素、科幻设定，还是穿越情节、喜剧效果，观众对于该类型的辨识就是故事“真相”存疑，以及对于故事结局揭秘“真相”的预期。总结来看，悬疑剧就是以真相存疑与揭秘为主导风格的电视剧。这一形式特征使得悬疑剧惯常与刑侦题材绑定，迎合观众对于“凶手是谁”的好奇与探索欲望。但需要注意的是，“真相”的设定往往是多样的，并不限于主体定位，还包括时间、地点、目的等要素。

当然，好奇“凶手是谁”只是最浅层次的意义期待，悬疑剧暗合的深层次动因是观众对真实意义的渴望。从符号学的视域来看，“真知，是任何意义理论的核心问题，追求真知也是人的意识活动的最根本的动力”（赵毅衡，2016，p. 78）。这种对于真实意义的追求与探索，是人确立自身存在的基础，即主体性确认的前提。事实上，悬疑剧以类型剧的叙述形式建构了一个稳定的意义世界；在这个意义世界中“真相”是稳定的，且绝对不会空缺。这与现实世界形成了鲜明对照。

反观现实，后现代话语消解了宏大叙事，真理、真实、真相等与“真”相关的意义遭遇解构。蓝江指出：“一旦客观性原则和理性原则不再成为接近真相的途径，人们就会摒弃向外部寻找的事实性依靠，从而转向内部，寻求内心中的慰藉。”（蓝江，2017，p. 13）但是，向外寻找或向内探寻的二元划分并未涵盖全域，影视剧提供了现实的拟像，制造了一种拟像真实，这使得人们对真实意义的获取有了一条折中路径。换言之，影视剧制造了一个拟像世界，既非实存的外部世界，也非想象的内在世界，它介于两者之间，让观众站在全知视角审视并获取其真实性，由此满足观众对于真实意义获取的稳定感。

在悬疑剧制造的拟像世界中，真实的意义标准与判定是稳定的。从空间上看，影视剧“向我们呈现的，始终是一个画框里的世界。画框（银幕边缘、摄影机取景器）成为一个观众无法超越的、先在的选择”（戴锦华，2004，p. 2）。也正是由于画面框架的限定，这个拟像世界的边界变得清晰，让观众始终有一个获取真实意义的锚点，真相也始终在框架之内，逃不出观众的总体视域。从时间上看，拟像世界中所有事件的因果链最终会得到澄清，不同人物的活动轨迹得到完整串联，观众基于人物选择与事件动态可以导向实在的价值判断，且这一判断扎根于真相。总结来看，悬疑剧的类型风格与叙述形式为真实意义的生产提供了一个稳定场域。外部世界真实意义的模糊，反

而会推动悬疑剧的生产与传播。观众对于真相的渴望，恰恰反衬出他们对周围世界真实性的怀疑。

二、叙述困境背后的价值旋涡

影视剧构建的拟像世界为民众投射情感期待提供了路径，而国产悬疑剧的兴起正映射了当下人们对于真实意义的需求。悬疑剧作为一种类型的独异性，不仅在于叙述过程制造真相的迷雾，更在于叙述结果澄清真相的本质。具体而言，在悬疑剧叙述的第一个层面，叙述过程制造的各种谜团，反映了人与实在世界之间的意义关系，即每个人总是受制于个人视角，难以把握世界的真相，因此，叙述展现的真实总是有限的，剧中人物总是无力的。在悬疑剧叙述的第二个层面，观众可以跃出主人公的视角局限，综合不同人物视角下的事实，掌握多重视角凝合的真实，获得凌驾于剧中人物的权力感。因此，真实虽是局部的，但观众通过重组真实获得了意义满足。悬疑剧这两个层面的叙述形式恰恰契合了类型判定的双重标准：形式重复与观众预期。

从叙述形式来归纳悬疑剧的类型特征，需要着重考量四个谜团：（1）凶手是谁？（who）；（2）凶手为何犯罪？（why）；（3）凶手在哪里？（where）；（4）怎么抓住凶手？（how）。国产悬疑剧难以绕开对这四个谜团的程式设定，同时也陷入了这四个谜团程式的限制。具体而言，国产悬疑剧总是会同时聚焦几个问题推进，而随着四个问题的全部解决，真相最终得以揭示。与之相较，韩国电影《杀人回忆》始终没找到凶手，此类叙述形式上的先锋性为国产悬疑剧所排斥。究其根源，国产悬疑剧的真相设定一定要满足观众对于真实意义的确定诉求，如果遗漏其中任何一个谜团，悬疑剧本身所要建构的真实意义也就被消解掉。

国产悬疑剧的繁荣依托于真实意义的稳定输出，而真实意义的呈现又依赖于固定叙述程式的重复。作为悬疑剧类型特征的四个谜团，始终以形式羁绊限定内容输出，只要有一个谜团存疑，该剧就无法结束。换言之，真相必须以完备的形式呈现，才能让观众获得意义满足。凶手的动机不明，抑或凶手没有被捉拿归案，这类形式的欠缺会导致叙述文本的断裂，而断裂导致的价值观崩塌难以契合普通观众的情感结构。“文化始终都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而‘情感结构’也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它集中反映了一代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意义与价值。”（汪民安，2011，p. 244）对于此种情感结构的分析，恰可以指向当代中国人总体价值观的意义排序。

当代国产悬疑剧的价值划分不再是纯粹的二元对立，换言之，不同价值

观的合理性得以并置，观众的意义阐释也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在此基础上，国产悬疑剧又对不同的价值旋涡进行了排序，由此契合当代中国人的情感需要。也正是通过对剧中价值旋涡的辨析，本文试图澄清阐释社群达成的文化共识。

所谓价值旋涡，是指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产生冲突并形成解释旋涡，“两套元语言互不退让，同时起作用，两种意义同样有效，永远无法确定。两种解释悖论性地共存，并不互相取消”（赵毅衡，2016，p. 234）。对应到悬疑剧中的价值观设定，主要包含三类价值旋涡，即个人与集体、善与恶、真相与谎言，它们两者之间彼此冲突却自有其合理性，这也使得悬疑剧谜团的设定要根据价值旋涡来排序。

悬疑剧的第一层价值旋涡是个人与集体。凶杀案的发生就是个人对家庭结构的瓦解，凶杀制造的死亡也会引发集体恐慌。悬疑肇始于某个脱离社会秩序的个体，悬疑的揭秘在于找出并消除这个不安全因素。而国产悬疑剧有意制造个人与集体的价值旋涡，冲击固有的价值序列。在《无证之罪》中，杀人凶手骆闻曾经是法医，制造“雪人杀人案”的目的是引出多年前的罪犯，也就是说，杀人的目的是找出凶手。骆闻的杀人动机在于找到家人的下落，保护家庭的价值诉求有其合理性，与此同时，杀人行为又制造了个人情感与集体利益的矛盾，由此剥离了杀人的合理性。剧情以骆闻的死亡抵消了集体施加的道德压力，又以警官林奇击毙罪犯李丰田收尾，捍卫了集体的社会秩序。在个人与集体的价值旋涡中，国产悬疑剧赋予个人悖逆集体以有限正当性，而观众包容的前提又建基于善与恶的评判。

悬疑剧的第二层价值旋涡是善与恶。从事实层面论，杀人者因背离传统伦理规范而被视为恶，但国产悬疑剧塑造了人性多面性，在不同视角下赋予善与恶以相对价值。如《繁城之下》中魏知县的杀人行为与报恩目的相统一，被杀者同时又是多年前的作恶者，如此，杀人行为被赋予了正义价值，行为的恶与道义的善共存。又如《漫长的季节》中沈默深受他人戕害，所杀之人都在道德上有所亏欠，如此，杀人的恶与恶人的被杀相统一，消弭了纯粹善恶的界限划分。在善与恶的价值旋涡中，两种价值观都是相对的，观众对于善与恶的评判又全部立足于故事全域构成的真相与谎言。

悬疑剧的第三层价值旋涡是真相与谎言。围绕真相与谎言的纠缠成为悬疑剧的基石，其他的价值旋涡都发端于此。观众对于真相的确认凌驾于其他价值旋涡的博弈之上，个人与集体可以有矛盾，善与恶可以交叠，但真相与谎言必须澄清。如在《沉默的真相》中，严良调查江阳案，江阳调查侯贵平

案，层层嵌套的案件侦查都在指向多年前隐匿的真相。在揭示真相的过程中，善与恶、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冲突都被消解，观众将所有价值旋涡都自然化，唯独坚守最终的真相，不容任何谎言的掺杂。这种对真实意义的捍卫，超越了道德制约（个人与集体）与情感诉求（善与恶），映射了阐释社群在文化认同上的最高要求，但此要求也反映了当代文化现实最大的困境。

悬疑剧的叙述形式在拟像世界中颠倒了实在世界的价值排序。国产悬疑剧生成的三重价值旋涡内含着固定的意义排序，即“真相与谎言>善与恶>个人与集体”。换言之，单个人的行为可以与集体价值冲突，只要这个人是善的，而评判此人善恶的依据又必须是真相。与之对照，现实生活反而要求此意义排序的颠倒，即“真相与谎言<善与恶<个人与集体”。换言之，真相总是相对的，谎言充斥着日常，因此，对于人的道德评判往往支撑起其可信度。

三、后真相时代的情感结构

悬疑剧作为类型剧的存在并非独特现象，青春剧、穿越剧、科幻剧、历史剧等自有类型定位，但近年来国产悬疑剧的兴起与繁荣却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类型剧的创作与传播都需要考量市场的需要，而某类剧作的井喷式生产必然迎合了观众群体的意义需要，如此，研究特定类型剧的总体状况及其文化价值，显然成为理论观照现实的内在要求。

从马克思主义美学来看，文艺的生产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即用审美的形式对意识形态进行加工。因此，文艺的形式中渗透着意识形态，同时，文艺形式的变革也伴随着意识形态的转变。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形式的重大发现产生于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它们体现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式以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新关系。”（伊格尔顿，1980，pp. 28-29）依此逻辑，国产悬疑剧的井喷式繁荣对应着大众意识形态的流动，也正是通过对悬疑剧内在形式的剖析，我们可以窥见阐释社群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模式与感知结构的变化。

雷蒙德·威廉斯指出：“感觉结构可以被定义为溶解流动中的社会经验，被定义为同那些已经沉淀出来的、更加明显可见的、更为直接可用的社会意义构形迥然有别的东西。”（威廉斯，2008，p. 143）国产悬疑剧典型地表征有别于日常生活经验的情感结构。具体来说，日常生活经验中真实意义的缺场，与悬疑剧中真实意义的稳定输出形成对照。拟像真实取代了原初真实，填补了观众对于最终真相的意义期待与渴望。

悬疑剧的叙述困境恰是其优势所在，“谜团的必然揭示”与“真相的最终

到场”构成了国产悬疑剧的叙述程式。由此，谜团遮蔽与真相揭露所构成的意义张力成为国产悬疑剧繁荣的动力源。在不同价值旋涡的博弈中，国产悬疑剧建构了迥异于日常生活经验的意义排序，从而契合了观众对现实世界的怀疑态度，凸显了真实意义在情感结构中的优先地位。

回到悬疑剧的叙述形式来看，其主导风格就是制造怀疑，即“悬念”与“疑问”的底层逻辑都指向了对现实本身的怀疑，真相的揭示就是对怀疑的完美诠释。怀疑情绪的普遍蔓延是后真相时代的总体精神状况，这类情绪反而助推了拟像世界的建构。影视剧作为当代观众主要的情感投射对象，帮助人们释放这种怀疑情绪，由此获得对真实意义的信任感，并在获取真实感的过程中强化对自我总体性的感知。观众如侦探一般，始终在一种不信任表象的氛围中，保持注意力的集中与精神的警惕，笃定要找出最后的真相，也正是在找寻的过程中，剧情的叙述与个人情感同频，叙述形式的程式化契合了观众对完整真实的渴求。怀疑式观看不仅生成了有关“何为真实”的意义，同时也生成了“何为正义”的道德观。如此，对剧情的阐释就不只是猜谜/解密式的智力冒险，还是重塑道德观念与情感认同的意识训练。

国产悬疑剧搭建了真相优先的叙述结构，这与后真相时代迥异。如果只研究国产悬疑剧如何叙述，那显然仍是在形式层面打转。将研究指向国产悬疑剧对真相的阐释，反而可以从形式层深入集体意识层（内容层）。重要的“不是对叙事的阐释，而是作为叙事的阐释”（菲尔斯基，2023，p. 141）。通过对国产悬疑剧叙述形式的总结归纳，我们可以看到谜团的固定设置是类型剧的本质要求，但通过对其中变异形式的剖析，更可以看出内在价值旋涡的博弈与重新排序。具体而言，国产悬疑剧将犯罪者与受害者都塑造成“中间人物”，如《隐秘的角落》中的张东升、朱朝阳、普普，又如《繁城之下》中的陆直与小宝子，《漫长的季节》中的王阳与沈默……这些人物无法用善或恶来评判，他们往往背离集体秩序，但观众用“善与恶”的价值旋涡消解了单向度的道德评判，由此将个人悖逆集体的动因合理化；同时，观众在“真相与谎言”的总体构架中转向了对事实层面的关注，由此悬搁了道德与情感层面上的文化压力。“中间人物”的大量出现弱化了单一价值标准的力量，同时也透露出多元主义的潜在影响。

此外，国产悬疑剧刻意将寻找真相者塑造为“异质人物”，如《三大队》中的程兵，《漫长的季节》中的王响、龚彪、马德胜，《沉默的真相》中的严良，《狂飙》中的安欣，《回来的女儿》中的陈佑希……这些人物背离固有社会秩序的要求，也以非常规路径搜寻线索，因此显得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

寻找真相者一定“不正常”，这一叙述策略刻意将真相寻找者排除在大众之外，标出真相获取的特殊性与异质性。“异质人物”的价值恰在于捕捉到观众难以厘清的真相，观众也期待“异质人物”通过特殊办法确认事实，这恰恰反映出观众集体无意识中的“越轨”冲动，即跳出社会规约，冲破现实阻挠，由此获取真相的情感结构。

犯罪者与/或受害者是“中间人物”，寻找真相者是“异质人物”，他们合力冲击了社会现实的稳定结构，也挑战了固有的道德秩序。换言之，谜团的制造与真相的揭露都需要采取非常规路径，这也映射了作为常规的社会大多数恰恰可能在真相之外。国产悬疑剧替代性地满足了僭越常规的冲动，也模拟性地实现了获取真相的需求，伴随着该类型剧的形式重复，观众的情感结构也得以与后真相时代调和。

结 语

国产悬疑剧的叙述形式建构了一个异质空间，也重估了一系列价值旋涡，通过形式分析，本文辨析了该类型剧价值旋涡排序与现实世界的颠倒，也从这种颠倒指向了观众对后真相时代现实的怀疑以及对真实意义的渴望。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意义的匮乏助长了符号的生产。国产悬疑剧的兴起与繁荣恰是大众怀疑情绪普遍增强的表征，该类型的重复与变异又映射了大众情感结构的流动。

悬疑剧始终围绕“真相”展开，这既是叙述形式的要求，也是内容阐释的导向。“在根本意义上，真相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而政治本质上是社会问题。没有社会共识就没有经验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社会秩序能够产生出可接受的普遍后果，满足人们的公平感，产生出必要的社会共识，后真相现象才能得以克服。”（汪行福，2017，p.16）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悬疑剧借由社会问题的外壳，穿透社会秩序的内核。国产悬疑剧经由对“真相”的诠释，让真实意义重新统摄社会共识，由此完成其叙述形式的文化功能。

引用文献：

- 戴锦华（2004）. 镜与世俗神话.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菲尔斯基，芮塔（2023）. 批判的限度（但汉松，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蓝江（2017）. 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 探索与争鸣，4，10-13.
- 麦金太尔，李（2023）. 后真相（张美华、相欣奕，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普林斯，斯蒂芬（2018）. 电影的秘密：形式与意义（王彤，译）. 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

□ 探索与批评（第十一辑）

- 邱振刚（2020）. 类型化转向与现实主义回归：谈悬疑电影的发展态势及其问题. 中国文艺评论, 10, 74-81.
- 汪民安（2011）. 文化研究关键词.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汪行福（2017）. “后真相”本质上是后共识. 探索与争鸣, 4, 14-16.
- 威廉斯, 雷蒙德（2008）.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 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 杨晓林（2019）. 新世纪以来中国悬疑电影创作论. 上海艺术评论, 3, 30-32.
- 伊格尔顿, 特里（1980）.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赵毅衡（2016）.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2016）. 真知与符号现象学.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 78-84.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

作者简介：

陈文斌，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符号美学。

Author:

Chen Wenbi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 research field is Semiotic Aesthetics.

Email: dgsycwb@163.com